

叙事分析: 网络社会认同研究的方法

王冠^{1,2}

(1. 山东大学 社会工作系, 济南 250014; 2.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2)

摘要: 网络社会认同力量的彰显, 使得网络社会认同的研究方法成为“显问题”。就目前学界对于网络社会认同的相关研究看, 主要是采用量化的方法进行研究, 这种方法存在多方面的问题, 而质性研究方法中的叙事分析可以作为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但是, 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差异、网络认同与现实认同的不同导致网络叙事与现实叙事之间也存在较大的不同。所以, 在进行网络叙事分析时, 需要注意改造原有的叙事分析, 采用多维叙事、螺旋阐释等叙事分析以更有效度地研究网络叙事。

关键词: 网络社会; 社会认同; 叙事分析; 社会学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C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13)07-0038-06

截至2012年12月底, 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64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39.9%; 90.3%的网民在家里使用电脑接入互联网; 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由2011年下半年的18.7小时增至19.9小时。^①这些数据反映出, 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而且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已经形成。进入网络社会, 社会结构会呈现出新的变化, “其中最突出的变化莫过于缺场交往的快速扩展、传递经验的地位提升和社会认同的力量彰显”^[1]。不断彰显力量的社会认同, 是成员的主体性得到较为全面展示的认同, 属于真正意义的社会认同。对于此种具有真正意义的社会认同, 从方法论的层次上, 应该采用何种社会学方法进行科学有效的研究呢? 这就成为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网络社会认同量化研究及其缺陷

从孔德提出要建立一门实证社会学至今, 量化研究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虽然胡塞尔、加芬克

尔、舒茨、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福柯、布迪厄、吉登斯等社会学家对于量化研究提出了诸多评判, 但量化研究仍然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方式。就中国社会学来讲, 虽然费孝通在晚年提到的“文化自觉”言犹在耳, 郑杭生提出的“理论自觉”得到学界的普遍赞同, 但是量化研究仍然是社会学研究中被普遍青睐的研究方法。

社会认同是“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 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 (group membership) 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2]。也就是说, “社会认同”词语本身与感觉、意义等主观内容联系在一起, 而这种主观内容一般属于相对难以量化或者无法进行精确量化的范畴。不过从目前对于网络社会认同的研究看, 虽然由于网络社会属于一个新的领域并没有被给予较多的关注, 网络中的社会认同研究的直接文献也不多, 但是与网络中社会认同相关的间接文献却是非常多的, 比如关于网络中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性别认同等的研究, 这些研究本身并没有超越量化的方法, 而是较多体现了量化色彩, 大多通过问卷调查收集资料、通过对于资料进行量化分析, 讨论性别、年龄、职业、学历、人格、态度等变量对于认同的影响, 检验假设进而得出结论。这些研究既没有办法提出新的解释, 也无法解释网络中社会认同的形成、运作与发展的相关机制, 更无法深层次探讨网络社会认同相关问题的解决。

事实上, 网络社会认同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 不是社会认同本身作为研究选题的问题或者作为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2年7月23日发布。

收稿日期: 2013-02-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形势下社会认同的分化与整合研究”(10JJD840004)

作者简介: 王冠(1983—), 男, 讲师, 博士研究生, 从事社会学研究。

研究对象的问题,而是属于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即量化方法作为社会学主要研究方式,本身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导致研究一方面只能停留于面上或者难以深入,另一方面带来社会学的“理论承诺与理论原则之间的矛盾”^{[3]24}。理论承诺具体表现为经验性和整体性,而理论原则则表现为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那么如何实现方法上的突破,让社会学的理论承诺与理论原则保持统一呢?

刘少杰在综合已有的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学应该关注“生活世界”的主张。“生活世界是人们的原初世界,生产世界和科学世界是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并且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其根基仍然是生活世界。因此,从生活世界出发,不仅使社会学立足点更真实,更基本,而且从根本的意义上涵盖了从生产世界和科学世界出发的意义。”^{[3]27}也就是说,生活世界是一个未分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主观与客观是合在一起的,这种生活世界既有结构与行动的交互作用,也有“场域”、“惯习”和“资本”的持续发展,更有个体与社会的互构。

回归到“生活世界”,意味着在开展社会学研究时,不能仅仅关注客观或者主观,而应该把客观与主观有效地结合起来,如此才能真正立足于“生活世界”,在此基础之上的方法才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量化方法存在的问题,而质性研究无疑就是立足于“生活世界”的方法。

量化研究存在问题,无疑让质性研究有了用武之地。不过,当我们了解到量化研究存在的问题、回到“生活世界”研究网络中社会认同时,在注意到社会认同的主客观统一性的同时,还需要理解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其他区别。希尔弗曼(David Silverman)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讲,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观察法——量化研究强调初步的工作,比如编制问卷之前的工作;质性研究强调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基本方法。第二,文本分析——量化研究强调内容分析,比如按照研究者的分类进行计算;质性研究强调理解参与者的分类。第三,访谈——量化研究强调对随机样本以封闭式问题为主的调查研究;质性研究强调对小样本的开放式问题。第四,记录——量化研究强调偶尔用来对访谈记录的准确性进行检查;质性研究强调用于理解参与者如何组织他们的谈话以及身体活动。”^{[4]95}也就是说,在方法方面,与量化方法相比,质性研究更重视文本、理解、开放式问题,重视

记录。

同时,量化研究存在问题,并非意味着量化研究不能进行社会学研究或者质性研究方法就一定属于好的方法。陈向明指出“量的研究从特定假设出发将社会现象数量化,计算出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出科学的、客观的研究结果;而质的研究强调研究者深入到社会现象之中,通过亲身体验了解研究对象的思维方式,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之上建立情境化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的意义解释……它们被认为分别代表了两种十分不同的科学范式。”^{[5]1}

而且,还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质性研究虽然立足于“生活世界”,但是其并非就是完美的或者优越的,希尔弗曼(David Silverman)指出:“我们绝不能假定质性方法具有内在的优越性。事实上,对某些我们感兴趣的研究问题来说,有时候量化方法更合适。因而,在选择方法时,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想发现什么。量化方法也好,质的研究方法也好,没有哪种方法在本质上比其他方法更优越。”^{[4]5}不过对于不能有效揭示网络中社会认同作用机制等量化研究存在的问题,质性方法确实可以尝试回应与解决。

二、叙事分析与网络中社会认同研究

质的研究有着多种方法。莫斯(J. Morse)指出,按照研究的问题来讲,质的研究主要涉及五大类问题,每一类问题对应独特的分析研究策略:意义问题(了解生活经历的本质)——现象学;描述类问题(对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信念和行为进行描述)——民族志;过程类问题(了解时间维度上事情发生的变化,研究问题可以呈现阶段性和不同的层面)——扎根理论;口语互动和对话类问题——常人方法学和话语分析;行为类问题——参与型观察和质的生态学^{[5]47}。

就网络中的社会认同来讲,其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意义问题,还有行为、描述、互动、对话等问题,所以上述理性类型划分的单一种类是无法有效地分析社会认同的。而且,网上社会认同的呈现是以语言、符号、句子、段落等表现出来的,这种呈现更多地聚集于某一个话题的讨论中或者某一个事件的追踪探讨中,特别是对于某一个网络事件的集中探讨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网上社会成员的认同。比如“郭美美事件”、“雷政富事件”、“微笑局长事件”、“7·23动车事件”等,无论是事件本身的报道,还是跟帖、回复、评论或者微博发布等,以及在其中丰富的表情运用、名人话语引

述、事件性质总结与反思等,均为了解网络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也就是说,对于了解网络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类型、性质、建构、表达、结构、功能、变迁等内容,网络事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所以,如果能够对于这些网络事件进行深入分析,无疑就能够深入地把握网络中社会认同的各方面内容。

而对于网络事件的分析方面,叙事分析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叙事是“跨越时空连接并配置而成的模式化关系的网络,而且意义、因果关系和真理就被认为是以这些事件和空间的安排、顺序和配置为基础的”^[6]。叙事分析是“通过对叙述材料基本内容的分析,解释叙事者如何在所叙述的经历中建构意义的,以及这种个人的意义建构过程又是如何与社会世界联系起来的”^[7]。叙事方法并非属于莫斯所说方法中任何一个问题类型之中,但是却有效地整合了对于莫斯所谈到的问题的分析,其可以对于意义类问题、描述类问题、过程类问题、口语互动和对话类问题、行为类问题进行单一或者综合研究,再加上叙事分析擅长于分析事件,并且能够在重视叙事结构、叙事互动的同时还注重叙事背后的意义,这些方面均与网络中社会认同的分析要求不谋而合。

在这里可能会涉及其他方法特别是田野方法“为什么不可以”的问题。无疑,通过田野方法,研究者可以深入到研究者的文化或者事件中,全方位搜集被研究者认同的相关资料,而且研究者也可以通过诠释、理解等方式理解被研究者。但是在田野方法中常常存在“文化殖民”和“文化识盲”的问题,即研究者常常按照自己的理解、框架设定对被研究者所提供的资料进行片段化的处理,断章取义地理解。

对于田野方法的问题,葛忠明指出,“使用这样的技巧,即便是当时当地的脉络中真正理解了人们赋予其行动的主观意义,并将当下的行动与行动者的过往的历史,与其所处的宏观社会脉络联系起来,但由于不能将当下的语言和行动组织起来,形成有结构的形式——叙事(叙事结构),同时还因为使用这样的技巧往往遗漏了微观互动的情境对被研究者的影响(叙事脉络),因此应用这些技巧很难说能够落实真正的诠释”^[8]。亦即,个别的概念、片段式的语言,常常导致原有意思的偏离或者曲解,而且导致分析流于表面,再加上常常忽视微观情境的影响,导致一些田野方法在对阵叙事分析时落于下风。以任娟娟对于网络中的穆斯林社群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研究^[9]

为例,其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搜集资料,但是在具体的资料分析中,作者“抽离”出部分的话语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且这些用于证明自己的观点的资料,也主要是按照序号比如“1-1、1-2、1-3……”罗列出来而没有任何关于这些话语的分析。如此,至少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这些罗列的资料之间是什么关系,其是否能够有效地证明作者的观点;第二,这些被罗列出的资料,是否还有其他意义。从这篇文章中,我们无法看到上述问题的答案。而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就仍然停留于被他人诟病的“神秘化”阶段,学术的发展也会在一些方面受到制约。

就目前来讲,对网络中认同的叙事分析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在一些社会学学科之外的研究中,比如陈静静曾经采用叙事分析的方式对“互联网对族群认同的建构”^[9]进行了研究,其研究展现出了整体叙事——内容分析,并且在其中对个别词语进行了阐释。可能由于作者所要说明的问题——“少数民族认同建构的互联网的宏观影响”——的限制,而没有对叙事进行深入分析,这无疑为其文章留下了较大的缺陷。因为没有完全展开的叙事分析比如“整体叙事——形式分析”、“部分叙事——内容分析”、“部分叙事——形式分析”等,恰恰包含着其他还没有被认真挖掘的互联网对于认同建构的影响,甚至这种影响或者作用机制也是体现于未被展开的叙事分析中的。

三、空间差异、社会认同的差异与不同叙事

把叙事分析引入网络社会认同研究中,可以开展许多在现实社会中难以进行的社会认同研究,如同性恋、艾滋病患者等至今受到一定歧视的社会群体的社会认同研究。不过当把叙事分析用于网络认同研究时,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从方法的角度看,来源于“在场空间”的叙事分析在网络空间中是否仍然存在有效性?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网络空间不同于“在场空间”,卡斯特曾经用“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10]⁴⁶⁸进行空间差异的比较。“流动空间”就是我们所说的网络空间,这是一种新空间逻辑,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流动是其基本特征,而且属于没有历史意义的空间;地方空间则是在场空间,是具有历史意义、我们共同经验的空间。

“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差异,展示了网络空间与“在场空间”的不同,同时网络空间中社会成员的快速流动性,导致个体的叙事可能是在

不同的时间段展现出来的,并且更重要的是,由于每个人的认同表达均受到个人内在情感体验等因素的影响或约束,所以我们还常常发现个体在叙事中可能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所以网络社会的认同建构有着较多的个体能动性色彩,其呈现本身有着较多的不稳定性。其实,何明升、李一军的探讨对于我们理解这种状况或许是有帮助的,他们认为:我们对于网络的现象的认同的理解,应有该有一种“虚拟真实观”^[11]。“虚拟真实观”既虚拟既真实,或者是真实的直接反映,或者是另外一种真实。高兆明也指出,在网络这个公共空间上,存在着两种我——“真我”与“网我”^[12]。“真我”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我,其受到现实角色世界中各种规范的有效约束,“网我”是一种部分去除了各种矫饰的“真我”,但是此种真我却失去了直接社会监督,去除了熟人社会的各种压抑而成为裸露的“我”。这种“网我”也被有的学者称为“第二个自我”^[13]。这种“网我”打破了“真我”的诸多限制与条件,在网络对话中个人无需顾及自身的经济收入、政治地位、文化声望、种族、性别、年龄等在地方空间中无法回避的因素,也不用考虑各种世俗偏见和利益冲突,而是可以无障碍地进入到对话之中。

网络空间与“在场空间”是相互作用的,网络社会成员同时也是“在场空间”社会成员,网络中的个体自我虽然可以采用任何语气、任何可以想象的语言、任何代表自己想法的表情等展现自我,但是自我的各种判断仍然会受到“在场空间”社会成员各种经验、实践、文化等的影响。而且正如卡斯特所说,“流动空间是一种支配性的空间”,即网络空间也会影响、作用于在场空间,而且这种作用是主导性的;网络空间是一个真正具有社会意义的空间,“即经历了数千年与自然的史前斗争(首先是求生存,然后是征服自然)之后,我们的物种所达致的知识与社会组织水平已容许我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上是社会性世界之中”^{[10]578}。由此,网络空间上的社会认同必然也以某种(些)方式与“在场空间”中的社会认同相互作用,从而导致出现许多前所未有的认同作用形式与架构。

针对“网络空间与在场空间”的差异与相互作用对社会认同带来的影响,Palloff 和 Pratt 指出,网上社会认同相对于网下社会认同来说,是一个再建构的认同,具体的建构过程就是库利所说的“镜中我”实现的过程^[14],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网络中社会认同的结构还是社会认同的表达,在体现出与在场空间差异的同时,也呈现出与现

实社会认同之间的相似之处。

从差异的层面讲,无论是网络的叙事结构、叙事意义、文本展现、话语层次、言语等均展现出与传统叙事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形成对于叙事研究者的挑战。从叙事结构的角度看,传统的叙事结构一般说来是非常明确、前后统一的,而网络的叙事结构则是模糊的、多元的,有时主题并不分明,顺序表现也不明显,而且常常出现前后不一致的叙事,其挑战叙事研究者的理性抽象概括与判断能力。从叙事意义的角度看,传统的叙事意义是叙事反映了个体的所思所想、从诸多的叙事中能够抽离出一个中心,与社会、政治、经济或其他的某些方面相对应;但网络叙事由于网络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导致发现叙事的意义本身具有多重性,而且这些多重性的意义有时会存在矛盾,因此增加了解与分析网络社会成员真正认同的困难,更挑战叙事研究者本身的思维习惯,其需要有着更多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从文本展现的角度看,传统的叙事文本虽然也有着多种形式,但是均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过程与后果等,而网络叙事文本多数情况下后果是不明确的,而且人物本身的身份是难以确定的,这挑战了叙事研究者的文本把握能力,更增加了文本鉴赏的难度。从话语的层次的角度来讲,传统叙事一般说来层次分明,中心思想、关键段落、重点语句、核心词语能够较为容易地发现或者推断出来;而网络叙事本身的话语层次可能是不清晰的,可能诸多叙事中有着多个中心或者没有任何一个主题,这种状况挑战了叙事研究者的判断能力。从言语的角度看,传统叙事分析中的言语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话语,而且很少出现不常见的符号。但是,网络叙事的言语一般采用网络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比较喜好使用的词语,比如火星文、生僻字、新生词等是比较常见的形式,如果不了解这些词语,那么叙事分析是无法开展的,这种状况挑战了叙事研究者的学习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沿用原有的叙事方式进行网络社会认同研究分析,无疑会形成“解码”偏离原来的“编码”的状况,形成对于网络社会认同理解的偏离、阐释的谬误,进而形成错误的结论。因此,叙事方面的差异,意味着如果继续沿用原有的叙事分析必然有着较多的限制。但是,网络叙事主体与传统叙事者均属于社会成员的现实,使得网络叙事与传统叙事在叙事的起源、叙事中的概念、叙事的过程等方面又是一致的:从叙事的起源看,均是描述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从叙

事的概念看,均使用社会成员耳熟能详的概念;从叙事的过程来看,均是追求一个事件最终的完全展现。

网络叙事与传统叙事的异同,在挑战叙事分析者的同时,决定了我们在对于网络叙事进行分析时,在传承传统叙事分析的方法的基础之上,也需要有新的突破,如此才能够适应网络空间的研究。

四、切合网络社会认同实际的叙事分析

无疑,叙事分析关注叙事结构、叙事意义和叙事互动。传统的叙事分析中,已经形成了针对这些不同叙事方面的探讨方式。在叙事结构方面,主要关注叙事构成要素和叙事顺序。不同的叙事构成要素与顺序形成不同的叙事结构。西方学者瑞思曼认为至少存在三种叙事结构:拉勃夫(Labov, 1972; 1982)的结构取向(structural approach)、博克(Burke, 1945)的拟剧结构(dramatism)和基(Gee, 1986)的诗意结构(poetic structural approach)^[8]。叙事意义则是叙事本身所要表达的意义,代表叙事者自身的意见、态度、想法、价值判断等内容,这种意义以或明或暗的方式体现在叙事中,是我们分析叙事时应该把握的关键内容。而叙事互动方面,则关注叙事本身所使用的符号与符号的表达。

在进行网络社会认同的叙事分析时,无疑也需要关注叙事的结构、叙事的意义和叙事的互动,但是这里所说的叙事结构、叙事意义和叙事互动已经体现出多元化的色彩,即多元的叙事结构、多元的叙事意义、多元的叙事互动,而且这种“多元化”本身能够使得网络叙事本身的特点与其所反映的社会认同的状况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那么如何体现这种多元化呢?

马茨·艾尔维森和卡伊·舍尔德贝里为此提供了解答,他们指出,我们在进行叙事分析时,应至少把握如下四个方面的原则:(1)不同身份认同或声音之潜在可能性中的多元论,不同的身份认同或声音又贯穿于或被视为存在于研究工作和研究文本中的不同群体、个体、立场或特别利益相关联;(2)对于研究过程中的个体参与者所传达的(同一个个体参与者作出多重表征的可能性)多元论及其变种的接受;(3)关于现象的可供选择的表征(比如,对于不同种类的描述性语言的运用);(4)对不同理论视角(根本隐喻)的把握,并且对于这些视角的批判及其问题颇为熟悉。这使得公开的和不同种类的读本在研究中显现出

来^[15]。

也就是说,“多元化”关注多种声音、多种声音表达、多种声音之背景。这种“多元化”的叙事分析方式是对于传统叙事分析方式的突破。在这种“多元化”的叙事分析方式之下,我们应该抛弃原有的单一中心、单一主题、固定结构的叙事分析幻想。同时,社会认同叙事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被研究者本身范围扩大并且变得不那么清晰,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也是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位置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研究者在进行叙事分析时,不能够进行固守于某一个理论架构、受限于某一个特定范式。传统的叙事结构涉及两种类型:一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叙事结构,即网络上本身呈现的叙事结构;另一种是作为研究者的叙事结构。在叙事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不应该将自己的叙事结构运用于研究对象的叙事结构之中,更不能用自己的叙事结构去理解研究对象的叙事结构。“多元化”的叙事方式改变了这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叙事结构的划分,我们会发现多元化叙事方式中更多地体现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的叙事结构,结构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相互联结、表现形态等均表现出差异性。

多元化的叙事是一种多维的叙事,在进行叙事分析时,研究者一定要能够寻找并且提炼出被研究者叙事的多维内容,而不应停留于自己所设计的一维或者几维内容架构中。

不仅如此,传统的叙事分析过程也需要发生变化。对于如何进行传统叙事分析,陈向明曾经指出具体的分析步骤:原始资料的整理、阅读原始资料、登录、寻找本土概念、资料的系统化^[16]。原始资料的整理既包括叙事者所说的话,也包括叙事者在说话的时候的各种表情;阅读原始资料是认真推敲叙事者所说的话语,在语言、内容、主题、叙说等方面找到叙事者文本的结构、叙事的意义等;登录是指将有意义的词、短语、句子、段落等标示出来,打散原有的资料,赋予概念和意义,然后以新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寻找本土概念即被研究者经常使用的、用来表达其思想的基本概念;资料的系统化包括建立编码系统和归类系统,如果码号非常多,则要进行归类,归类时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报告的形式等确定。传统的叙事分析更多地体现为针对某个主题的一次性阐释;而网络的条件下,不仅有了多维的主题,而且阐释也不能是一次性完成的,而应该是一个逐步的、递增的、不

断修正与完善的叙事,所以整个过程也形成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要求研究者具备一种弹性思考(thinking flexibly)^[17]的能力。弹性思考是一种突破既有思考框架的思考方式,其表现为:重新表述(rephrasing)、改变图解(changing diagrams)、连续比较(constantly comparing)、与同伴分析者交谈(talking with fellow analysts)和定期的疏远(periodic distancing)。

不仅如此,为了有效地在叙事分析中融合“多元化”,真正有效地展开网络社会认同的叙事分析,我们还应该强调反思性(reflexivity)、相关性(relationality)和知识文化的历史性^{[6]94-96}。反思性强调的是对于网络社会认同研究者自我认识的反思,比如对于研究者在进行社会认同研究时的研究范畴、研究预设、研究结构、研究过程等的反思;相关性强调的是社会认同概念本身是处于场域概念网络之中的,其与其他概念比如性别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等密切相关,此种概念在概念网络中具有一定的位置并且与其他概念形成一定的关系,所以对于社会认同概念的探讨必须关注概念词汇的空间状况;知识文化的历史性强调时间在社会认同概念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此种历史性要求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将思想和知识置于适当位置以及什么使它们出现。

如此,采用多维叙事、螺旋阐释、弹性思考等内容的针对网络社会认同的叙事分析,属于更具效度的研究方法。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此种叙事分析的效度,不是求全责备的效度,即我们同意叙事者有选择地叙事,同时也同意叙事分析者有选择地进行叙事分析;但是此种叙事分析的效度一定是可以被信赖的效度,即虽然叙事分析者可以选择网络认同的叙事内容进行分析,但是其选择一定是采用系统的方法对于网络社会认同的叙事者进行再诠释,而此种诠释的呈现本身是被他人或者读者所信赖、认同的,由此此种叙事分析就具有了效度。

参考文献:

[1] 刘少杰.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J]. 学术月

刊 2012 (10).

- [2] 豪格,阿布拉姆斯. 社会认同过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9.
- [3] 刘少杰. 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4] 希尔弗曼. 如何做质性研究[M]. 卢晖临,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 [5]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 [6] 萨莫斯. 公民权的私有化:如何改变对知识文化的看法[C]//比尔纳其. 超越文化转向. 方杰,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91.
- [7] 陆益龙. 定性社会研究方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193.
- [8] 葛忠明. 叙事分析是如何可能的[J]. 山东大学学报,2007 (1).
- [9] 任娟娟. 网络穆斯林社群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对中国穆斯林网站 BBS 社群的个案研究[J]. 青海民族研究 2008 (2).
- [10] 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王志弘,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11] 何明升,李一军. 网络生活中的虚拟认同问题[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1 (4).
- [12] 高兆明. 网络社会中的自我认同问题[J]. 天津社会科学 2003 (2).
- [13] 刘燕. 媒介认同:媒介主体身份阐释及其网络认同建构[J]. 新闻记者 2009 (3).
- [14] PALLOFF,PRATT. Building online learning communities: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the virtual classroom [M]. San Francisco, CA: Jossey - Bass 2007:5.
- [15] 艾尔维森,舍尔德贝里. 质性研究的理论视角:一种反身性的方法论[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224.
- [16] 陈向明. 教师如何做质的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160-162.
- [17] 洛弗兰德,安德森. 分析社会情境:质性研究与分析方法[M]. 林小英,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248.

[责任编辑:高云涌]